

德國媳婦中國家



Petra Häring-Kuhn



[德] 海珮春 著

Meine Chinesische Familie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德國媳婦中國家

Meine Chinesische Familie

〔德〕海珮春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媳妇中国家 / (德) 海珮春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9
ISBN 978-7-108-03527-1

I. ①德… II. ①海… III. ①纪实文学—
德国—现代 IV. ①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6546 号

封面题字 关愚谦

责任编辑 徐国强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19.5

字 数 240 千字 彩插 2 印张

印 数 00,001 — 15,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序

李 昕

由于从事编辑职业的关系，一年到头通常要阅读百余部书稿。读得多了，难免眼光有些挑剔，或者神经有些麻木，于是便常常抱怨书稿平庸或者沉闷，缺少亮点和光彩，让人提不起神，调动不起激情。然而，当我打开愚谦先生和珮春女士从德国发来的电邮，读到《德国媳妇中国家》的书稿时，顿感一股鲜活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令我精神为之大爽。我忙戴上花镜，捧着电脑，急不可耐地将它一口气读完。尽管此时，这部作品还略显粗糙，需要打磨、加工、整理和润饰，但是作者独具的才情和书稿所显露出的鲜明特色已然令我拍案叫绝。考虑到作者还在等待我的回音，我迅速在电邮里写下这样一行字：“大作已拜读，总的印象是：一个字，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好极了。”对方闻之自然欢欣鼓舞，于是我们的出版合作正式展开。

其实，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部书稿。

我和愚谦、珮春夫妇相识在十几年前，那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而愚谦先生是香港三联书店一向倚重的老作者。他虽常住德国，但在香港名气很大，是《信报》的专栏作家，也常常在凤凰卫视开讲时事问题。大约在2000年，愚谦先生围绕自己“文革”期间“叛逃”的经历写成了纪实性文学作品《浪》，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就是我担任

责编。我至今记得自己初读书稿《浪》的体验，简直把愚谦先生惊为天人，万万想不到眼前这位仪表堂堂的华裔德国汉学家竟然是“文革”期间与马思聪“叛逃”案齐名的另一重大“叛逃”案的“主犯”。开新书发布会那天，愚谦先生请来了多位“大腕”助阵，其中不少香港传媒界、文化界的名流，光是凤凰卫视，就来了吴小莉、何亮亮和曹景行，大家都对愚谦先生的坎坷经历感慨万分。到那时我才知道愚谦先生交游广泛，他的身边永远是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但在这样的场合，愚谦先生的夫人珮春总是比较低调，她在先生的身旁，不抢镜头，也不争话语权。当大家谈论愚谦先生的书时，她听得很专心，却很少插话，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贤惠善良，与愚谦先生正好是夫唱妇随的一对。尽管，她有时会突然说出几句笑话，自嘲一下或者捉弄一下愚谦先生，令大家忍俊不禁；有时也会用西方人常用的耸耸肩、摊摊手一类的动作表达她固有的幽默感，但愚钝如我，却并不能从中察觉到她与其他的外国媳妇有什么不同。然而几年以后，我回到北京三联书店任职，在北京又与他们重逢，忽然得知珮春这几年辞去一切职务，在家专心写作，收获甚丰，不仅迅速成为了德国知名的作家，而且已然和愚谦先生一起被请上了法兰克福书展里著名的蓝沙发，那可是全世界的畅销书作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啊！从此我便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了。

重逢的话题之一就是珮春正在写作的一本关于愚谦先生和他的中国家庭的书，我立刻意识到这本书的价值，当即约稿，并安排好了责任编辑，一切有如箭在弦上。可是珮春写得很专心，很认真，因而也很慢。差不多过了三四年，其间我催稿无数次，这部书千呼万唤始出来。不过，总算工夫不负有心人，它带给我们的惊喜足以弥补时间拖延所带来的遗憾。书写得精彩，尽管它的内容不过是些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之间的琐事，没有多少缠绵曲折的情节，但是作者娓娓讲来的故

事仍然很抓人，让你时而为主人公的命运牵肠挂肚，时而又为作品中的趣闻乐事报以会心的微笑。读后掩卷遐思，得到的竟是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起初我有些不解，弄不清楚作品的艺术魅力从何而来？毕竟它写的是普通人的家庭、普通人的生活。但细想才发现，书中的内容非但不普通，而且十分特殊：

首先，作品中的愚谦先生是个非同一般的中国丈夫。他惊心动魄的“叛逃”经历和大起大落的命运，他富于戏剧性的去国与归国，他一腔热血忧国思国、渴望报国的心态，始终是整部作品的主线。他的形象，可以借用和改动那句著名的歌词“让西风吹拂了四十年，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来形容。这个人物决定了作品的基调和主题，他的悲、怨、喜、乐，直接牵动着读者的情感。

其次，作品中的中国家庭也非同一般，它是个典型的中西合璧式的家庭。它保持着中国固有的三代同堂的大家族结构，遵守的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一些传统道德规范。但由于愚谦的父亲早年留洋，后来又投身革命的关系，加上近百年来现代教育的影响，使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家庭对西方的观念是开放的、理解的、包容的。一家几代人多能操流利的英语和珮春对话，仅凭这一条，就可见出这个家庭的西化程度。正是这个家庭中西融合的环境，给了珮春观察和写作的方便，使她不仅可以带着西方人的眼光去看待中西家庭的异同，而且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自然而然、如鱼得水地融入这个家庭，并且以主人的身份写下这本书。

再者，作为德国媳妇，珮春也是非同一般的。她爱中国，熟悉中国，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当年为了编写中国旅游指南一类的书，她跑遍了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去了很多中国人也很少去的地方。谈起话来，她对中国的名胜古迹如数家珍，常令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自叹不如。她几乎对中国特有的一切都感兴趣，学中医，

扎针灸，练气功，讲食疗，甚至跟着街道里的老头老太晨练、出操、跳街舞。她对中国社会融入之深实为罕见，令人惊叹。同时，作为一位女作家，她的心极细，观察力极敏锐，善于从微小处辨析中国文化的特点，特别擅长从日常生活小事中发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特征。她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这在作品中表现为乐观包容的心态和聪慧机智的表达，这些再配上轻松活泼的文笔，给作者笔下那些原本平平常常的生活故事增添了无穷趣味。

从一滴水可以窥见大千世界。或许就是因为丈夫、媳妇和家庭这三个要素都“非同一般”，这本书便得以用一个特殊家庭几十年的变化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社会变迁和精神变迁。它通过描写三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相当清晰而深入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老一代追求光明、正义和社会进步的理想主义，中间一代一脉相承的进取精神和报国志向，以及下一代崇拜西方追求物质享受的务实倾向，都展现得真实准确。同时，又通过作者对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描写，揭示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历史与现实。不错，的确是由于国在变，所以家在变，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也在跟着变。在中国多角度多方位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作品的主人公珮春，自己也在一步步地朝中国靠拢，从对中国有顾虑、不理解到熟悉、了解和热爱，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上海人，这本身就说明她这个德国媳妇已经变成了中国媳妇，其间的经历已经够得上是一部传奇。作家写作关于自己的传奇，怎么能不使读者期待呢？

愚谦、珮春夫妇嘱我为本书写序，自知才疏学浅，难当此任。但却之不恭，只能将一些读后感记录在这里，是为序。

目 录

序 李 昕 i

序 曲 001

第一部 德国媳妇 008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08

一个中国小伙子 013

愚谦的惊心动魄的经历 023

中国女孩子让我们一度分手 028

1975 年，我去了中国 033

周恩来、毛泽东之死 041

学汉语 044

闪电结婚 050

只身闯台湾 055

宾客盈门 059

和愚谦偷返大陆 063

接外甥女到德国 066

儿子关新来信了 070

意外打击 073

我变成了中国的奴隶 078

第一次被约写书 080

第二部 中国家 084

夫妻双双把家还 084

我非要向公公下跪磕头? 096

我的公公关锡斌 112

“表姐”慧善 125

哥哥迪谦 132

母亲的骨灰 136

周恩来并没有发脾气 140

过春节 141

到天津走亲戚 147

再一次狼狈去国 160

豪华轮的邀请 165

愚谦的中国心 168

洋媳妇受到热情接待 170

敏谦的故事 174

进庙烧香 179

到外交部去告状 183

五台山历险记 188

热情的愚谦娘家亲戚 200

第三部 国在变，家也在变 206

初次见儿子小新 206

与小新同行 212

哥哥迪谦出国记 227

中国悄悄在变 234

给小新提皮包 237

在出国潮中 239

中医、气功的神奇 246

CHINA 拆哪！ CHINA 拆哪！ 260

练功队的一员 265

公公活到一百岁 268

灰姑娘摇身变成企业家 271

这哪是旧日的中国 275

天时、地利、人和 280

和老总理施密特交友 282

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上海人 284

结束语 291

跋 关愚谦 294

序 曲

中国农历大年初二，这个花花世界刚刚迈入新世纪才不到几年，中国大变了，北京也大变了。北京城飘着雪花，室外的温度已经降到零下十五度。可是，我住的北京寓所里所养的花却吐出了嫩嫩的新蕊。这不太合乎逻辑，但却给我们的寓所增添了一些浪漫。其实，就这几天来说，这个浪漫已是多余的了。因为我的心前所未有地那么暖洋洋。这么多年来，我作为一个中国媳妇，来过北京无数次，但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快乐。因为今天在北京发生一件不合乎逻辑的大事，我的丈夫关愚谦过生日。他的儿子关新在北京五星级的昆仑大酒店为他庆贺。当天晚上，酒店宴会厅金碧辉煌，三个大圆桌坐得满满的。应邀的客人除他的亲兄弟姐妹外，还有过去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在一个单位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在不同时代结识的老朋友。在我的眼里，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人，换在德国，都称得上是社会名流，知名人士。单单从职业来看，他们之中有大学、中学校长，有前部长、前大使、总领事、参赞，有作家、文学评论家、教授、工程师，有画家、音乐家、表演艺术家，还有曾派驻国外的新华社记者。这些人都曾经为国家做过一番贡献，并且兢兢业业地继续工作着。除了我和我的一个德国女友安柯外，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合乎逻辑。按理说，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在国内外工作了那么多年，请这样一些朋友来并不稀奇；但是对我这个丈夫愚谦来说，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因为还在尚可追忆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他还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叛逃分子，回国来是要枪毙的。

北京变了，也变得非常不合乎逻辑，变得让你眼花缭乱，难以置信。为了办年货，我和愚谦一起到北京左家庄附近的一家百货公司去采购，里面的货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采购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圆包、方包、大包、小包，口袋里抽出来的都是百元大钞，这是我以往来中国那么多次见所未见的。比起德国的圣诞节来，这里好像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我和愚谦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时，大箱小箱带了七八个，而现在，两手空空地来中国，然后买大批东西带回德国去，世道真是变了！

对一个人的生命说来也很不可思议。此时此刻，我竟然会置身一个生日宴会并和一个中国家庭结下不解之缘。中国北京——这个古老的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都城，孕育着多少文化和文明，发生了多少历史事件，而我竟然和她那么接近，甚至可以听到她的喘息、呼号、悲伤和欢乐，这些都缘于我结识了愚谦这么一个家庭。这一家人非比寻常，爷爷曾被满清皇帝任命为广东水师提督，外公是清朝的末代秀才，爸爸则是民国初期留洋回来闹革命的知识分子，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出自书香门第，是大家闺秀。1949年前共产党闹革命，愚谦全家都是追随者；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全家都是遭殃者。如果没有这场大革命，我永远不会结识愚谦和这个可歌可泣的大家庭。上帝巧安排啊！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命。

愚谦的一家姓关。爸爸关锡斌，曾为中国国务院参事、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姐姐关敏谦，当过联合国妇女委员会常委、中国妇联国际部部长。哥哥关迪谦，是北京一知名杂志总编，曾为北京记者协

会主席。愚谦的儿子关新，在上海有一个自己开发的投资公司，进展得相当不错。此外，关愚谦还有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以及堂姐、堂兄、堂弟、表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以及他们的小辈，加起来可以组成一个大团队。这就是中国伟大的家族文化。愚谦常常骄傲地说：“我们关家的家谱记载，我们这支的第一个人是一千八百年前三国时代关云长关公的儿子关平。”《三国演义》中关平是关羽的义子，但在正史中关平则是关羽的长子。他们这一支还出过关天培这样的民族英雄。一个家族的历史竟能追溯得这样久远，真让我们西方人大开眼界。两千年前，我们德国人还不知在哪儿，有的或者还在树上爬呢！

刚刚我还只提到一半，愚谦的母亲一家姓言，更是正宗的书香门第，是孔子的学生言偃（字子游）传下来的。中国文化真有意思，祖祖辈辈传了有六七十代，到愚谦外公家还是儒家子弟。愚谦母亲是典型的文化人，非常有教养，当了一辈子的老师，能书能画，能中文能英文，不愧是诗书世家的后代。我们曾到愚谦母亲老家、她的出生地常熟去过一次，那里还有纪念子游的言子墓呢！母亲叫言忠芸，舅舅家都是“忠”字辈，舅舅、姨妈、表弟、表侄女，一拉出来又是几十口人，都姓言。表弟家都是“良”字辈。这也是中国优秀文化的特点，两千年来一线相系，绵延不断。子子孙孙都很尊重自己的长辈和家姓，我太欣赏了。不像我们德国人，乱起姓。比如德国目前的大姓施耐德（Schneider，裁缝之意）、鲍尔（Bauer，农夫之意）、穆勒（Mueller，磨坊主之意）都是前代人按自己的职业，随便当作姓传下来的。我家姓海林（Haering），来自一种鱼的名字。

愚谦父母两家加起来的“近亲”就有四五十人，已把我弄得眼花缭乱，更不要说那些远亲了。他们有的叫我婶，有的叫我姨，还有的叫我婆婆、奶奶。最初，我怎么也不习惯，我没老也要被他们叫老了，到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这种大家庭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形成了东方的特定文化，这对我们欧洲人来说难以想象的。我们德国人谁还记得三代前的家人是谁，哪来那么多的亲戚关系和称谓。我甚至和我的叔伯姐弟都很少往来。并不是我们不愿意，我们见面时也很热情，但亲戚关系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记住中文名字的功夫甚至好过记德国人的名字，原因是我旁边有一个中国丈夫，他被我问东问西，只好一再重复，我就记住了。有一次，他被我问得烦死了，就给我画了一张亲戚表。它像一棵大树，枝枝叶叶非常茂盛。

这里有一个极有意思的真实故事，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愚谦的母亲有一个堂妹言忠蕙，嫁给了安徽一家大户人家苏家，是户大盐商。二十世纪，战争不断，这个大家族大部分人都搬到大城市上海。愚谦一家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来到上海避难，远亲反而走得很近。

愚谦少年时，常随母亲到苏家做客，与表兄姐都混得很熟。1985年，愚谦和我到上海旅游，散步到新闸路上，他忽然说：“这不是苏家吗？我记得他们住的就是这座房子。”

“隔那么多年了，他们会不会搬家？你的记性会那么好？”我说。

“要不要敲门问问？”愚谦问我。

“我认为不好。不过，你们中国人的风俗，你比我知道得多。”

就在此时，门打开了。出来了一个老大婶，她首先见到我一个外国人在她家门口前面站着，觉得很奇怪。就在这时，愚谦叫了一声“砚耕姐姐”，他认出了她。自从1949年愚谦去北京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有多少话要说啊！砚耕姐姐太高兴了，她一定要留下我们吃饭，她还记得愚谦小时候喜欢吃的几样菜式，这使愚谦非常感动，但是愚谦说：“可惜我们明天就得去香港。”

“去香港？你和苏务滋、费彝民有联系吗？”愚谦摇摇头。

“她也是你的亲戚，是我的叔伯姐姐。她的丈夫是费彝民，大公

报社社长。你应该去看看他们。”

费彝民在香港鼎鼎大名，愚谦希望多给报纸写文章，当然愿意认识。因而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给苏务滋打了电话。几句话谈下来，苏务滋立即知道这个表弟是谁，他的妈妈是教书的，爸爸是和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的。加之愚谦又从德国来，他们当然很感兴趣。

第三天，他们见了面，认了亲戚。苏务滋就说，在香港还有一个苏家亲戚，“我的叔伯姐姐苏燕生，她的儿子住在德国，你应该和她认识认识。”不见不要紧，这个燕生表姐非常好客，对我们非常热情，她的长子又在德国当医生，家就住在离汉堡不远的不来梅市。虽然这个亲戚关系已经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但是我已经入了关家门儿，就不得不按他们的规矩办事，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洋亲戚啦！

就这么转来转去，愚谦的亲戚圈在香港越滚越大，苏燕生的丈夫是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厂的出品人袁仰安，她的二女儿是鼎鼎大名的芭蕾舞舞蹈家毛妹，二女婿则是香港前政务司廖本怀。他们都成为了令愚谦脸上增光的“亲戚”。大家一见面，都能谈到一起。

又是一个夏天。我们又来到香港燕生表姐家做客，同桌吃饭的有她的大女婿沈鉴治。大女婿一表人才，衣冠楚楚，竟然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高才生，香港一家大报社《信报》的总编。愚谦和他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沈鉴治刚来这家报社不久，正在扩充《信报》评论版的写作班子，还在物色笔杆子。愚谦在香港报刊发表过几篇文章，他都看过，于是便提起请愚谦也给《信报》写上一两篇。他说，《信报》是文人办报，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各种意见都可在报上发表。

就在此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当总书记，提出“改革”和“透明”，全世界都在关注事态发展。愚谦曾经是苏联专家的翻译，对俄国、中国的政治都颇为了解，现又常住欧洲，喜欢写作，这真是应了中国的名言：天时、地利、人和。两人一拍即合。可以这么说，在香港邂

逅了《信报》总编沈鉴治，完全改变了他这一生的命运。二十多年来，他给《信报》写文章，绝对不在外人前提起他们的亲戚关系，不然转了几个圈的亲戚，一算辈分，沈鉴治比愚谦还矮一辈，这传出去怎么行，何况他比愚谦还大一岁。

看到这既神秘又可爱的中国家族文化，我忍俊不禁。上海人常有看“西洋景”一说，那时还没有电影和电视，上海小孩子们到城隍庙去玩，可以花几分钱从一个大柜子的玻璃小洞里看西洋人的生活照片。现在好像还有。而我现在是看“东洋景”，更确切地说，是看“中国景”。有多少西洋人能像我这么幸运，融入中国的社会如此之深。我这一生真是活得太值了。

从那时起，我对中国的古老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学过中国历史，后来转入中国文学，最后研究中国医学。我发现这个国家的古老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世界上能够与之相比的国家并不多。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够保持如此长久的家族文化的历史和凝聚力，甚至延续两千余年，是一股什么力量在维系着它？愚谦回答我说：“应该是她的文字和文字记载下来的从未间断的历史，当时的皇帝统一文字还是很有眼光的。”

我从一个天真烂漫、懵懂无知的女学生成长为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作家，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文化赐予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我从过去对中国毫不感兴趣，到感兴趣，到全面投入，再到把她记录下来出版成书，这与认识愚谦和了解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一个女友甚至说，我的生活完全被愚谦颠倒了。这点我坚决不承认。我是自愿走进去的，因为这个国家的文化真是太丰富迷人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愚谦对我的影响确实是重要的。他静不下来，整日满脑袋的中国文化。为了多做点事，好让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他绞尽了脑汁。他一年四季读书、教书、写书、处理欧洲华人学会的

事务、组织文化交流等社会活动，只要一有时间还要去旅行。他不但自己忙碌万分，也把我拉进去，除了教书我不能代替他外，别的事我样样都跟着干，不得空闲。尤其是中国越来越开放，我们可以经常回中国探亲和旅游，我的眼界开阔多了。

学中医，本来是为了满足我学医的一个心愿，没想到通过到处拜师，通过了解中医知识，我有机会接触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文化人，我有一个感觉，“三人行必有中医”，个个都能说一套。我与各行各业的中国人交往时，当他们感到我对中国文化发生莫大兴趣时，都愿意和我交朋友。我开始发现，写作比学中医更有意思。中医我很喜欢，但学透它太难了。不过，我写书可以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而中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效果会更显著。我开始对写作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愚谦非常支持，我们两个竟然成了一对写作伙伴。他了解东方文化比我深，我了解西方文化比他深，我们可以互通有无。到现在，我们已经用德文合写了好几本书了。不过，这本书是我自己的功劳，与他无关。